

讲学社丛书

/ 03

东亚近代 文明史上的 梁启超

[日] 狭间直树 主讲
张勇 / 评议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 主 编

文
景

上海人民出版社

Horizon

讲学社丛书

东亚近代 文明史上的 梁启超

[日] 狭间直树 主讲

张勇 / 评议

高莹莹 / 译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 主 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东亚近代文明史上的梁启超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 主编 [日]狭间直树 主讲 张勇 评议

出品人：姚映然

责任编辑：李 頔

封面设计：蔡立国

出品：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8号林达大厦A座4A 100013)

出版发行：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北京汇瑞嘉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制版：北京大观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开本：890×1240mm 1/32

印张：9.5 字数：163,000 插页：4

2016年6月第1版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定价：42.00元

ISBN：978-7-208-13727-1/K·250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亚近代文明史上的梁启超 /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
主编；[日]狭间直树主讲.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

(讲学社丛书)

ISBN 978-7-208-13727-1

I. ①东… II. ①清…②狭… III. ①梁启超 (1873~1929) — 人物研究 IV. ①B25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71867号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请致电本社更换 010-52187586

講學社簡章

一 本國因於時現代高而於粹之學說隨時介紹於國中使國民思想發揚使學界之振奮年延聘各國最著名之專門學者巡回講演

二 以每年聘請一人

聘費

由基金會充撥

其

基金會

充撥

其

基金會

充

三 聘請者先注重其大思想家其餘各科之學

以學者後擴充法以次修聘

以學者後擴充法以次修聘

四 本國設董事若干人計畫事業之進行其

董事所聘之人由董事決定

其

董事

所聘之人

由董事決定

其

董事

所聘之人

五 本國設管理基金若干人專司募集其

基金且保管之

其

基金

且保管之

其

基金

且保管之

其

六 關於講演事項隨時與國片及學校各團體接洽

附錄

总 序

还在清华国学院尚未复建之前，我和陈来兄就猫在家里，大致设想了未来的“三大讲座”，也就是将要设在清华园里的“梁启超纪念讲座”“王国维纪念讲座”和“陈寅恪纪念讲座”，它们将分别处理“思想与宗教”，“美学、比较文学与汉学”和“边疆民族史”的不同课题。

也是早在那时，我们就已经清晰地意识到，这种工作将是接着梁启超，特别是接着他所创建的“讲学社”来做的。正因为这样，我在本院所接受的第一次访谈中，就已经非常明确地这样提出：“这种讲座形式本身，就是对本院传统的一种继承。不知你是否了解，中国现代史上几次最著名的来华学术交流，就是由梁启超组织的讲学社所发起的，该团体曾经每年一个，先后请来了美国哲学家杜威、英国哲学家罗素、德国哲学家杜里舒和印度大诗人泰戈尔，到中国来进行较为长期的学术交流，不仅在当年轰动一时，而且对于此后的文化也是影响久远。”

嗣后，幸赖学校与社会各界襄助，新的清华国学院甫一成立，我们的纪念讲座也就同时启动了。迄今为止，我们已经从

美国邀来了德里克教授、梅维恒教授和包华石教授，从英国邀来了麦克法兰教授，从法国邀来了巴斯蒂教授，又从日本邀来了狭间直树教授，——算起来已是累积了六次，而每次都为清华同学带来了精心设计的八周课程。

当然，在这么个“学术全球化”的时代，我们的对话意识也变得更强。正因为这样，我的每次开场白都要开宗明义：尽管请来的都属于名重一时的学者，但他们却并不是来照本宣科的，否则就跟又翻译了他们的哪本书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了。相反，他们被如此郑重其事地邀来，就是要到气氛活跃的课堂上，跟中国学者各抒己见地进行交流，甚至来跟学生们唇枪舌剑地交锋。而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还专门进行了制度设计，同时请来专业对口的中国学者来充任各个讲座的对话者，以便让同学们能从中看到，问题意识从来都是有“前理解”的，而知识生产也从来都是方生方成的。因此，真正会读书的读者和真正会听讲的听众，都不会只从一位作者那里，或者只从一位讲演者那里，就指望找到不可撼动的、足以当作信仰来膜拜的“绝对真理”；相反，那“真理”就算还确实存在，也从来只是隐隐约约地，闪现在互不相让的学术对话中，——从而在我们精心设计的讲座中，体现为增长着的文化间性！

如此热闹的“三大纪念讲座”，当然还是要坚持开办下去。不过与此同时，我们还有另一个愿望要还，因为就在上述的那次访谈中，我还曾透露了计划的另一半：“作为计划的一部分，

这种讲座一旦完成，马上就会进行翻译、整理与修订，以便尽快在一套新创的‘清华国学讲演丛书’中，公布给全社会！我们希望，诸如此类的深度学术交流，会为当代文化交锋留下一个活生生的样本，也向后人提供一个研究比较文学和学术交流的鲜活案例。”事实上，尽管尚未来得及奉献给社会，这项工作却一直在积极进行，包括整理、翻译和修改讲稿，包括组织中国学者的评议，也包括跟出版社商讨各种相关事宜。

而今，终于到了把它端出的时候了，免不了又要发笔再写一篇序言，来交代一下整个项目的来龙去脉。也差不多恰逢此时，原藏于南长街54号的任公手稿，也非常抢眼地出现在自己面前，——而无巧不巧的是，其中恰有一份以往不为人知的、梁启超亲笔手书的“讲学社简章”，其中的内容是这样的：

一、本社因欲将现代高尚精粹之学说随时介绍于国中，使国民思想发扬健实，拟递年延聘各国最著名之专门学者巡回讲演。

二、每年聘请一人，若基金充裕时再图扩充。

三、所聘请者先注重于当代大思想家，其各分科之专门学者，俟扩充后以次续聘。

四、本社设董事若干人，计画事业之进行，其每年所聘之人由董事议定。

五、本社设管理基金员若干人，专司募集基金且保管之。

六、关于讲演事务，随时与国中各学校、各团体接洽。

能够读到任公的这通手稿，心里真是说不出的高兴，而它的复制件也一直挂在办公室的门口！不要小看这份简单的章程，这对澄清围绕晚期梁启超的误解，具有相当关键的意义。正如我随即就此撰文指出的，“自从梁启超写出《欧游心影录》之后，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就总有人误以为他走向了守旧与落伍。然而，正在这个起草中的‘讲学社简章’，才证明任公仍然着眼于中西会通，——只不过，这位眼界更加开阔的思想弄潮儿，所渴望的却须是更加深入的会通，而为了达到这一点，就既要学术性地回归中国传统，也要倾听最高深的西学话语，更要鼓励两者间持续而激烈的对话。”

由此就更加想到，如果我们现在开展的工作，能被梁启超从地下得知，那他一定会乐观其成的。因为，这正是他在构想“讲学社”时，原本想要完成，却惜乎未克全功的思想事业。想到这一点，我们也就获得了新的灵感，把原拟称作“清华国学讲演”的这套丛书，索性命名为“讲学社丛书”。因为，我们正在进行的“三大纪念讲座”，正是接着讲学社的计划，接着任公的未竟事业来讲的。——甚至我还建议，就连这套丛书的装帧设计，也一定要凸显任公的笔迹，使读者能从斑驳的底色中，看出学术历史的坚持、强韧与坚忍来。

考虑到这一点，最后就要把一层意思再讲一遍，以回应晚

近民间勃兴的“梁启超热”。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对于任公来说实属不幸的是，他当年折冲于中西两端，想在其间执两用中的想法，对于彼时由于灾难深重因而急不可耐的中国来说，或许是显得太前卫、太先锋了，故而难以得到人们的理解。不过，从历史传承的角度来看，对于我们来说又堪称幸运的是，他这种大大超前的文化抉择，也正好成为了本院主张的先声，使我们的“三大纪念讲座”从一开始，就是“接着梁启超来讲”的，就是“接着讲学社来讲”的，——当然，因此也就是有“悠久历史传统”可继承的。

刘东

2013年4月8日于清华园立斋

目 录

序 言	001
第一讲 东亚近代文明史的时段划分	
——世界史的近代与东亚	007
一、就讲座题目的若干说明	007
二、东亚近代史的“文明史”时段划分	011
三、日本对于逃亡前的梁启超的意义	022
第二讲 身为康有为的弟子	
——以接受西方为目的的“康学”与“西学”	027
一、梁启超的学识——抑或是传统学术的基础	027
二、康有为的学生	029
三、逃亡之后的在日活动	037
四、日本支持者	041
第三讲 梁启超思想的独立	
——《清议报》时期	047
一、康有为的来日与梁启超	047
二、《清议报》的改编	051
三、《仁学》与《谭嗣同传》——康梁与谭嗣同的关系	058

第四讲 梁启超的“辉煌期”	
——《新民说》等	071
一、《新民丛报》的发行	071
二、梁启超掌握的新学理	076
三、关于“新民说”	080
四、“新民说”的立论基础和轴心的转移	083
第五讲 “预备立宪”时代的梁启超	089
一、清朝的“预备立宪”与梁启超的宪政视察报告	089
二、关于《请定国是折》	094
三、梁启超移居须磨	101
第六讲 民国初年的梁启超	109
一、回国后的政治地位	109
二、对日态度的变化	114
三、日本人的对华态度——吉野作造	121
第七讲 梁启超与历史学	
——1920年代东亚人文科学形成史的一个横断面	129
一、《中国历史研究法》	129
二、对桑原鹭藏的评价	138

三、作为“科学”的历史学	144
第八讲 《梁启超年谱长编》的编辑与翻译 ——梁启超年谱在近代东亚文明圈中的意义	151
附 录	
清朝的立宪准备与梁启超的代作上奏	175
“历史家”和其所写的传记	
——关于梁启超撰两种《谭嗣同传》及其他	195
《新民说》略论	219
评 议（张 勇）	253
印象记（高莹莹）	289

序 言

本书是2012年秋我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讲义，题目是《东亚近代文明史上的梁启超——以梁启超与日本在文明史上的关系为中心》。从2012年10月18日到12月6日，在历史系文北楼309教室，我与清华大学的学生们共度了八个周四的下午（14:20—16:00）。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为纪念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三位奠定了清华文科基石的大师，设立了“梁启超纪念讲座”“王国维纪念讲座”“陈寅恪纪念讲座”，邀请外国学者进行讲演。2010年10月12日，“梁启超纪念讲座”第一期“变革时期中国的文化与历史——全球现代性的视角”由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教授开讲。¹2011年，法国学者巴斯蒂（Marianne Bastid-Bruguière）教授（学士院院士）作第二期讲座，题目是“面向自由和科学理性：清末民初中国留法学生的经验与他们对中国的现代认同的贡献”。我的讲座是继这两位学者之后的第三期。

1 德里克教授的讲演经整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2015年出版，名为《后革命时代的中国》（讲学社丛书/02）。——编者注

2011年11月，国学研究院副院长刘东教授通过高莹莹博士向我发出“梁启超纪念讲座”的邀请。高莹莹博士现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与我是故交。当我还在日本的孙文纪念馆任馆长的时候，她在神户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攻读博士学位，同时兼任孙文纪念馆的外聘研究员。此次讲座，她从最初的联系事宜到讲稿的翻译都做了大量的工作，翻译方面自不必说，对我在中国生活的各方面也提供了无微不至的照顾。

本次讲座共分八次课程，每次连同翻译在内约100分钟。我从事梁启超研究已近二十年，对于明治日本在梁启超学识形成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目前可以说已经有了基本的理解，所以我非常愉快地接受了这次邀请，并定下题目为“东亚近代文明史上的梁启超”。八次课程的讲义内容可参见本书的目录。在每次课程中，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张勇教授都作为讨论人列席，他不仅给我提供各种帮助，还参加课后的座谈答疑，总会使我有启发。在答疑环节甚为热心回应我的是历史系戚学民教授。听讲的学生为“研究生及感兴趣的本科生”，人数在最初的课程上大约有50名，后来保持在30名左右。

讲义以及课堂的翻译都由高莹莹博士承担。值此书出版之际，我对原来讲义中简单带过的一些内容进行了补充，第八讲加入了课程结束后造访中华书局时见到的《梁启超年谱长编》“第一稿”，并对部分内容进行了重写。这里所说的“第一稿”，

是赵丰田 1934 年秋完成的“约一百余万字”的原稿，油印本《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是 1936 年 5 月在第一稿基础上压缩至 67 万字的“第二稿”。

清华大学的校园非常大，让人感觉教学场所散落在一片大森林中。学校给我提供了设施完备的宿舍（甲所），还为我在国学研究院所在的“立斋”提供了一间研究室。邀请方刘东教授和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教授自不必说，办公室康宽蕊主任在各项手续以及饮食等生活方面都给予了非常周到细致的安排。李颖繁女士在电脑设备等琐事上给我提供了各种帮助。她还在我到达清华之后的第二天带领我参观校内的各类设施，其中还包括校医院，以备我身体不适时前往。在清华的日子大都是晴好天气，又承蒙各位周到的照顾，所以顺利完成讲座而无须就医，这于我于邀请方都是不错的事情。

我到达中国后不久，10 月 23 日在清华大学召开了名为“梁启超与现代中国”的研讨会。与研讨会同期举办的还有“南长街 54 号”（即梁启勋故居）收藏的重要档案展览，就其内容研讨会上也作了讨论。梁启勋故居收藏的资料中有大量未曾公开的内容，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我多年的故交汤志钧、刘桂生、耿云志、姜义华、欧阳哲生、吴铭能等许多教授都参加了研讨会，所以也得以与他们一叙旧谊。

研讨会上，清华大学副校长谢维和教授致开幕词，然后每位学者就新出资料的意义以及他们关注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

见。我在会上介绍了日本新发现的梁启超信函，也就是2006年公开的现寄存在高知市立自由民权纪念馆的山本宪（号梅崖，1852—1928）旧藏文书。其中有九封是梁启超的信函（均为梁启超来日早期——1898年10月至1901年11月之间的信函，其中一份只有信封）。借此机会，在高知大学吉尾宽教授的全力帮助下，自由民权纪念馆（松岗僖一馆长）将信函复制本赠送给了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有机会成为双方交流的桥梁，我也甚感欢喜。

11月26日至30日，清华大学召开了梁启超系列演讲会。北京大学中文系夏晓虹教授，及清华大学陈来、刘东、张勇教授，还有我，分别进行了演讲。在主办方负责人刘东教授的安排下，我成为第四位演讲人。为了让听课学生以外的听众也容易产生兴趣，我把本书第八讲的内容稍作修改进行了演讲，不过成书时已调整恢复为原来的样子。

12月3日，在刘东教授的介绍下，在国学院从事梁启超研究的博士后谢伟铭女士陪同我一起参观了中华书局，目的是一睹赵丰田完成的“第一稿”。带领我们参观的是俞国林先生。据他介绍，由梁家提供的“梁任公年谱材料（第一稿即原始稿）”共22册（赵丰田在“梁年谱”上海本的“前言”中记载的是“第一稿二十四册”），分册装订全部现存于中华书局。不过由于搬入新社大楼，收藏情况也随之混乱，目前能看的只有第1—10册（同治十二年至光绪三十四年〔1873—1908〕）和

第22册（民国十七年至十八年〔1928—1929〕）。没能看到全套书当然非常遗憾，但能够有机会见到“第一稿”对我而言已经是意外之喜了。我在能够阅读的范围内进行了调查，并复印了一些需要的地方。受益于此，本书第八讲中提到的《梁启超年谱长编》的所有稿本、版本，全部得见。

本书所用的图表中，移情阁和吴锦堂（图5.1）由孙文纪念馆（安井三吉馆长）提供，吉野作造（图6.1）的照片由吉野作造纪念馆（佐佐木源一郎馆长）提供。在此一并致谢。

本书为课程讲义的译稿，所以一定兼具讲义的优点和缺点。恳请各位读者不吝批评。

狭间直树